

本书摘要

本书包括绪论、正文六章、结论、附录四个部分，主要探讨了明代中晚期从王阳明讲学至东林学派的讲学之间约一百年的讲学发展历程，以及讲学与政治、学术、社会道德等问题之间的关系。

明代的讲学运动是明王朝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社会经济发达及文化普及的反映，也是在阳明学学派建构中催生出来的一种要求。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中，讲学运动依托书院、会馆、精舍、山房、宗祠、贡院、寺庙、道观及山川秀美之处，遍布大江南北，尤以南方南直隶、江西、浙江为最。王阳明晚年将其绝大部分精力投放在讲学活动中，创立了最早的讲会——稽山书院讲会和中天阁讲会，并鼓励像惜阴会之类地域讲会的发展。王阳明逝世之后，朝廷对王阳明的不公正待遇激发了其弟子们以讲学来发扬师说、以建设书院来祭祀先师的热情。地域讲会开始流行，同门意识增强。学者们非但在各自的家乡讲学，还联合同门举行江浙大会，即便为官者也讲学不辍。然而，蓬勃发展的讲学运动所夹带的弊端，以及阳明后学之流弊，使讲学运动在嘉靖末年达于巅峰之后，在隆庆和万历初年先后遭到了来自高拱和张居正的压制。

尽管禁讲学的背后，不能不有其政治的背景，但在万历十年之

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讲学运动本身的问题,并赋予讲学运动维护或重建社会道德的责任。代表性的人物即耿定向与东林学派。东林学派在重整社会道德的同时,提倡以程朱为学,使其讲学活动在宗旨上逐渐摆脱了阳明学,从而开启了明末清初朱子学复兴之端。在这一历程中,政治、学术、道德诸问题与讲学夹杂不清,使得讲学活动的外部环境越来越恶劣,乃至引发天启六年大规模地禁毁书院活动,而首善书院的被毁则标志着明代讲学风潮的结束。

因此,综观明代中晚期一百余年的讲学运动历程,其过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从开放到内敛的取向。这与一般思想史上对晚明思想活跃、启蒙的定性似乎不同。

作者还认为,讲学活动以王阳明和王艮为源头而分为两系,即学院式讲学和庶民式讲学。当嘉靖年间两系讲学基本重合、互相支持时,讲学运动是开放的、活跃的、激进的;然而政治的打击以及正统学者对社会道德的关注,使庶民式讲学的环境越来越恶劣,而学院式讲学则越来越保守,两系讲学渐行渐远。学院式讲学挟政治、经济之实力,不断压缩庶民讲学的空间,最终将庶民讲学的思想家逐出讲学的主流圈外。至此,晚明讲学内敛、卫道的特性基本形成,并为清初的讲学活动所继承。

Abstract

The book consists of four parts: the introduction, the text, the conclusion and the appendix, with its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xue* movemen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period from Wang Yangming to Donglin. It also cov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ngxue* and the following issues: politics, learning, social ethics and so on.

In a way, *jiangxue* is a comparatively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Ming dynasty,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economic prosperity of Ming Dynasty, and also the inherent requairment of Yang-ming school.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 jia-jing, long-qing, wan-li, tai-chang and tian-qi, *jiangxue* movement developed quickly in shuyuan, huiguan, jingshe, shanfang, ancestral hall, examination halls, Buddhist temples, Taoist temples, and scenic spots. At that time, *Jianghui* spread widely in the whole country,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rn places such as Nanzhili, Jiangx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Wang Yangming, the founder of *jiangxue* movement, devoted himself to *jiangxue* in

his late years, and founded two early *jianghui*, namely Jishan Shuyuan *jianhui* and Zhongtiange *jianghui*. He also encouraged his disciples to found more and more *jianghui* like Xiyinhui. After his death, the government's unfair treatment to him aroused his disciples' great passion for *jiangxue* to memorize Wang by setting up lots of academies and develop his theory. Then regional *jianghui* became popular, and the awareness of fellowship grew stronger. Scholars gave lectures in their hometowns as well as the places where they held official positions, and also launched a United *Jianghui* of Jiangxi and Zhejiang. However, after the prosperity in the late Jiajing period, *jiangxue* movement was severely suppressed by Gao Gong and Zhang Juzheng, grand secretaries respectively in the periods of Long-qing and Wan-li, partly due to the inherent problems with the movement.

Of course there might be some reasons else for the suppression, but the scholars began to think about the problems with *jiangxue* movement, and tried to endow the movement with new responsibilities of safeguarding or restructuring social ethics. Best representatives were Geng Ding-xiang and Donglin scholars. In order to reestablish the social order, Dongling school advocated the learning of Zhuxi, shifting the theme from the learning of ming-and-heart to the learning of Zhuxi, and starting the movement of renaissance of Zhuzhixue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In that century,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ethical problems played multifarious role in the *jiangxue* movement, which ruined the external circumstance of jiangxue, and finally led to the suppression by the government. The destruction of Shoushan academy symbolized the end of *jiangxue* in Ming dynasty.

Looking back at the whole process of *jiangxue* in Ming dynasty, we can see an apparent tendency from open-mindedness to close-mindedness. Such a conclusion seems to be contrary to the view that the culture in late Ming is open-minded and illuminative.

However, we try to divide the *jiangxue* movement into two parts: Wang Yangming's *jiangxue* and Wang Gen's *jiangxue*. The former is academic, and the later plebeian. In Jiajing period, when the two schools strived for the same target and communicated frequently, *jiangxue* at that time was open-minded, active and radical. Later the political repression from government and the concern for social ethics of the orthodox scholars, worsened the circumstances of plebeian *jiangxue*. On the other hand, the academic *jiangxue* became more conservative and old-fashioned. Backed up by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the academic *jiangxue* narrowed the scope of plebeian *jiangxue* little by little, and finally wiped out the plebeian *jiangxue* from the mainstream. Since then, the conserv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xue* in late Ming came into being, and inherited by *jiangxue* movement in early Qing.

目录

序 言	1
绪 论	1
第一节 讲学与讲会	2
第二节 明代讲学的相关研究	15
第一章 兴起：16 世纪初期王阳明等人的讲学活动	34
第一节 正德及嘉靖初年阳明学的处境	35
第二节 王阳明及其门人对讲学模式的探索	47
第三节 湛甘泉、吕柟的讲学活动	57
第二章 高潮：嘉靖年间阳明后学的讲学活动	70
第一节 地域讲学：以安福县的讲学为例	74
第二节 大型讲会：青原会与水西会	82
第三节 同门大会：冲玄会与怀玉会	90
第三章 挫折：隆庆及万历前十年的讲学与反讲学	99
第一节 徐阶倡讲学	101
第二节 高拱反讲学	111
第三节 张居正禁讲学	120
第四节 论政治与讲学	137

第四章 反思：耿定向及其门人的讲学活动	145
第一节 世界心重：论耿定向	147
第二节 修德正俗：论刘元卿	156
第三节 圆宗方矩：论管志道	168
第五章 回归：东林讲学与讲学宗旨之变化	179
第一节 书院、文社及同善会	181
第二节 从个人讲学到丽泽约	192
第三节 讲学之宗旨：尊朱与尊经	206
第六章 终结：首善书院之讲学	217
第一节 首善书院始末	218
第二节 融门户以偕大道	225
第三节 讲学与党争	233
第七章 旁系：泰州学派的讲学运动	244
第一节 王艮与王栋	245
第二节 颜钧与罗汝芳	253
第三节 何心隐与李贽	262
结 论	269
第一节 讲学的两系：学院式讲学与庶民式讲学	269
第二节 从开放走向内敛：中晚明讲学风气的变迁	274
附 录 16—17 世纪徽州府的讲会活动	283
第一节 徽州府讲学的湛若水时代：1536—1549 年	286
第二节 徽州府讲学的王学时代：1550—1575 年	292
第三节 徽州府讲学的复兴：1588—1603 年	298
第四节 徽州府呼应东林的讲学：1604—1625 年	309
第五节 明末清初徽州府的朱子学讲会：1628—1735 年 ...	318

第六节 徽州讲会的类型：六邑大会和四府大会	327
第七节 徽州讲会运动与明清学术转型	336
征引书目	341
后 记	364

序言

明代前期、中期的思想界沉闷而无新义，科举取士主要以宋儒朱熹的经注作为考试的标准，致使朱学风靡一时，学者们依托于复性和躬行，没有自觉、自由的思想。物极必反，于是乎有陈献章、王守仁的理学革命，希望把个人的思想从圣贤的经书中解放出来。陈献章的“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主张，开自有思想的先声；而王守仁以己心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拒绝拜倒在圣贤脚下，更是思想界的一大革命。此后，人才辈出，都以追求思想自由为旨归，形成波澜壮阔的个人主义与博爱主义思潮。对此，美国学者狄百瑞首先作了精深的分析。这对于长期以来把王学斥责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中国学术界，不啻一帖清醒剂。

王守仁的心学最可贵之处，就是强调“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而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学者们走出书斋，各抒己见，讲学成风，各种讲会遍布大江南北，蔚为壮观。

陈时龙的博士论文《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参考前人吕妙芬、陈来、吴震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实证史学的方法，在广泛收集地方志和讲学者文集的基础上，对这一个世纪的讲学和讲会活动的历史进行梳理与重建。这无论对于学术史、思想史，还

是对于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都是极有意义的。

由于清初流行宋学,以后又流行汉学,学者们对于明代中晚期的讲学与讲会,似乎嗤之以鼻,以至于影响到近代学者。日本东洋史学的奠基人内藤湖南就曾指出:到了明末,学者间出现了一种新风气,即讲学(讲会)。讲学并非讲述学问,而是以学问为讲演的材料而已,然后进行禅宗式的问答,在口头上空泛地讨论学问。顾炎武、黄宗羲反对这种讲学风气。顾炎武的学术秉承了宋学精神,又是清代汉学的鼻祖,他的见解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就给陈时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充分发挥的空间,而且他确实作了出色的发挥。明代中晚期的讲学运动毕竟有它的历史地位,给当时及后世奉献了一笔可贵的思想财富。问题是需要分析讲学风气盛行百年之后为什么衰微了?衰微的原因是什么?他指出:明代中晚期百余年的讲学活动,是一个由开放走向内敛的过程,这个内敛的过程是与16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政治、学术、社会诸因素相关的。万历初期的十年,最高当局对于书院讲学的打压,不仅导致讲学趋于低潮,而且使以后的讲学者如罗汝芳、耿定向等人,把讲学的重点转向对道德的重建与维护;而东林学派的讲学更深入到学术道德的整顿,使后期讲学活动显得相当内敛,讲学宗旨向程朱正统回归,讲学风气趋于保守,讲学网络由全国性走向区域性。

全书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作为附录的“16—17世纪徽州府的讲会活动”,以五万字的篇幅全文发表于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二十期(2003年)。该文对从嘉靖到康熙的二百年中徽州府的讲会活动进行细致的实证分析,在资料收集、爬梳、整理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力图再现当年讲会活动的具体实态,由阳明学激荡

讲会之风,经湛若水、邹守益和王畿、祝世禄和潘士藻、汪应蛟和余懋衡、汪佑和施璜五个阶段,以阳明学开启,而由朱子学收尾,由小见大,基本上反映了全国性的讲学与讲会活动的走势。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指出:清代皖派朴学,就是由逐渐在徽州府讲会中取得优势的朱子学中脱颖而出的。

历史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满足于先入之见,以偏概全或一言以蔽之,难以复原历史的真相。明代中晚期的讲学与讲会,当然有“禅宗式的问答”,有“在口头上空泛地讨论学问”的倾向,但是也不尽然。东林学派的讲学与讲会,就注重四书的章句之学,不满于王门后学那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空疏学风。后期徽州府的讲会,与东林学派回归朱子学相呼应,开启了皖派朴学的先声,则又是另一个明证。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阳明学的流行,加速了儒学的通俗化。在这种背景下,讲学活动成为一种时代风气,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史的主题。因此,对于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讲学与讲会活动的研究,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陈时龙的专著,对于有志于研究明代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较完备的参考文献,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

陈时龙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这个人才荟萃的学术圣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希望他继续发扬刻苦严谨的治学风格,不断攀登学术高峰。

樊树志

2004年圣诞于复旦园

绪论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说：“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影。”^①明代的理学比宋代理学高明的地方，在黄宗羲看来，就是明儒能够对于哲学中各种概念的细微差别作出辨析。从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一种学术思想当其初创时总是具其规模气象而不缜密，到后来才渐渐趋于细节的分疏。明代理学上承宋元理学，处于理学发展的末期，其哲学思考趋于缜密，当属自然。然而，明儒“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的功力哪儿来的呢？自然一方面是学术积累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学者之间的辩论和相互启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明代学者之间面对面地讨论，在当时有一个比较时髦的术语，即“讲学”。清儒程嗣章说：“明代道学，固不及洛闽之醇，而穷经通儒，亦罕闻焉。独讲学之风，较前代为盛。”^②这句话，倒是比较精练地概括了宋、明、清三朝学术风气的区别：明儒既无宋代道学的醇正，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页5。

② 程嗣章：《明儒讲学考》，页1。

又无清代经学的穷通,独有讲学之风,蔚为大观。吴震先生也说:“在 16 世纪的明代知识界,‘讲学’本身俨然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或时代风气。甚至可以说,讲学活动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主要话题。”^①与“讲学”二字相关联的,还有“讲会”二字。讲会即讲学之会,也就是说大量的学者定期聚集在某个地点一起讨论哲学问题。讲会正是讲学风气发展到明代而臻于高峰时的产物。当然,对于讲学、讲会的定义和内涵,及其与明代社会的关系,不能不详加讨论。

第一节 讲学与讲会

首先,怎样理解“讲学”的含义?从字面上看,“讲”就是“言说”,就是通过语言表达而传送某种信息。无疑,这种信息就是“学”。因此,理解“讲学”的确切含义,关键在于了解不同时代讲学活动中的“学”之所指。也就是说,“讲学”这一概念的内涵随着学术变迁而发生变化。当然,大体上说,讲学是一种教育活动,可以是较高层次的学术切磋,也可以是较低层次的教化活动^②;可以是官方性质的讲学^③,也可以是私人的讲学。然而,官学数量的有限和效率的低下,使私学成为古代学者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官学

① 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页 3。

② 吴震先生《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所谓讲学,从狭义上说,无非是学者之间的一种学问切磋。从广义上说,讲学无非是一种教育、一种面向民众的教化活动。”(页 36)

③ 官方讲学,以明代为例,从最高统治者接受教育的“经筵”、“月讲”,到国子监的教育活动、地方官学的教育活动,皆可谓之讲学。

充其量只是一个资格或出身而已。因此,“讲学”在很大层面上是指“私人讲学”——据说创始者即孔子。

讲学始于孔子,是后代儒家的主张。晚明学者顾宪成就说:“讲学自孔子始。”^①儒家学者视孔子为私人讲学的首创者,是将“讲学”视作“儒学的讲学”。当然,何心隐就说,学与讲,其实可以溯源至伏羲、尧、舜、文、武等圣人,“又奚惟原于孔子而始有学名以名其所学,始有讲名以名其所讲耶!”^②其实,私人讲学的发生,可以追溯至西周的村塾。陈青之先生以为,《礼记·学记》郑注中“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室曰塾”的话,描述的就是归乡的士大夫在乡里讲学的情景^③。这大约可视为最早的私人讲学。春秋时期,讲学者也不止孔子一人。道家和墨家的讲学活动,都比较频繁。孔子讲学,不过诸家之一。不过,“讲学”的出典,却似出于孔子语录《论语》。《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后来的儒学传授基本上就是在“修德、讲学、徙善、改过”八字上作文章。清儒汪中解释“学之不讲”四字说:“讲,习也。习,肄也。古之为教也以四术:书则读之,礼乐同物,诵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让周旋,是以行礼。故其习之也,恒与人共之。学而时习之,有友朋自远方来,所谓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鲁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皆讲学也。”^④按汪中的解释,“讲学”就是“学习并实践礼、乐”;“讲”不只是简单的口耳相接,

①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十四,广文书局1975年影印本,页80,转引自吴震《阳明后学研究》,页423。

② 何心隐:《原学原讲》,《何心隐集》第一卷,页5。

③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31。

④ 刘宝楠:《论语正义·述而第七》,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页136。

讲的内容“学”包括一切与人的社会活动相关的礼仪和物事。这样的解释,可能确是真实地反映了孔子对于“学”的理解,但也许更多地体现了后儒对“讲学”的理想化解释。在躬行实践的学者看来,儒家当注重实际,即事即学^①。因此,“讲学”只是一种实践,而不是高谈阔论。但是,理想化的解释毕竟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事实上,讲学即是“口耳授受之习”。典籍之难得、学术之垄断,是口说传业以讲学发达的背景。葛志毅先生说:“先秦至西汉,口耳授受是其时各家通得的学习传习方式。”^②其实,即使到明清,乃至到今天,口耳授受之“讲学”也必不可少,变化着的只是讲学的模式而已。

孔子的讲学,是“一种流动式的讲坛制”^③。孔子门人众多,讲学甚久,但没有固定的讲坛。他的学生多半随从他四方游历,一面游历,一面讲学。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即说孔子曾与弟子们习礼于大树下。《庄子·渔父》说:“孔子游乎缙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据说,杏坛只是“泽中高处”^④,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各讲其学。孟子师子思,讲“仁义”、“性善”,辟杨朱、墨翟。孔孟之后,儒家讲学进入一个屈伏的时期。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初年,教育活动基本上为法家与黄老所把持。秦始皇“以吏为师”的诏令,更是剥夺了儒

① 明代学者吕柟就曾对弟子们说:“汝辈今日在此讲论,不消拘拘于经史上。即如今日用应接上下,或言语衣服,却都是学。故当时曾子、子夏讲论时,常说今日某人行冠礼差,又说某人行丧礼差,一一在这上面考究。今人说及此,便以为粗迹了。”参见吕柟:《泾野子内篇》卷十四,中华书局1991年版,页138。

② 葛志毅:《今文经学与口说传业——试析古代的讲学传业方式及其文化历史原因》,《历史教学》1994年第5期,页6。

③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页53。

④ 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本,页205。

家私人讲学的合法性。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倡儒家,遂黜百家而崇儒术、尊孔子。儒家之讲学,由此在朝廷提倡下重新繁荣,最初由国家提倡,后来学者自动地开门授徒,进行私人讲学。东汉经师们的讲学,非常普遍。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说:“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痒序聚横塾者,盖布之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嗜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像郑玄、马融,讲学之名甚盛,弟子云集。当时经师讲学,似不如后代理学家讲学之严肃。马融讲学,“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后汉书·马融传》)。汉儒之讲学,多是在私宅进行,偶尔建有精庐、精舍^①。精舍似后代之书院。清人尊崇汉学,往往立书院而以精舍名之。自汉至唐,儒者讲学方式大体相同,只是汉儒讲训诂,唐儒于训诂之外兼攻注疏^②。书院讲学,始于宋代。这是儒家讲学方式的一次重大变化。它的出现,与宋儒融合儒佛道三家精意创为宋明理学紧密联系。书院的出现,即模仿佛家禅林而设。宋代的学者,往往依山水佳胜之处,创建书院,传授理学。朱熹就是创建书院的积极推动者。不过,宋儒中也有不喜创建书院者,如陆九渊^③。但是,书院作为宋代理学的主要讲学场所是不争的事实。宋代书院讲学的内容,不再是汉唐的训诂注疏之学,而是与身心修为紧密相关的性命之学。

① 范晔《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刘)淑少习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②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页233、234。

③ 韩明士(Robert Hymes):《陆九渊、书院与乡村社会问题》,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主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页445—474。

然自讲学的形式观之,书院仍秉承汉代讲坛的遗意。陈青之先生即说:“宋代书院与汉代经师讲坛的性质很相类似,或者就是私设讲坛的遗意。”^①李弘祺先生以“绛帐遗风”指称书院之讲学,亦即此意。元代书院虽有官学化的倾向——主持者山长多由政府任免——然而大量的私立书院依然存在,讲学内容以理学为主,书院之私人讲学性质并未改变。

至此,讲学的历程可以梳理成:春秋战国诸子的游历讲学(孔子、孟子)——汉代经师的私塾或精舍——宋元的书院。自讲学内容看,则可梳理成:诸子学——汉代经学(古文与今文、讖纬与训诂)——唐代经学(训诂、注疏)——宋元理学(程朱理学、吕学、陆学)。明代的文学家归有光(1505—1571年)所说,“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②。“讲学”或“讲学者”,在不同时代则有专指。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内有一段话:“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③这便是以“讲学”专指“宋学”。因此,一方面,讲学“普遍受儒家学者的关注”,“具有了一种超乎时代的特征”^④,另一方面又在形式与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对于“讲学”的考察,必得综合各时代学术状况、社会状况进行。

明代的讲学,其时代的特征尤其明显。其最突出的特征,即是

①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页233。

② 归有光:《送何氏二子序》,《震川先生集》(四部丛刊)卷九,页9。按归有光此论,是欲引出其“圣人之经即圣入之道”的重经思想,并影响了明末清初的钱谦益、方以智等人。可参见何冠彪:《明末清初思想家对经学与理学之辨析》,《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页11。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

④ 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423。